

## 第二章 文獻回顧

### 第一節 所得分配與經濟成長

經濟成長、所得不均以及貧窮問題這三者間的關係乃是發展經濟學的中心課題。<sup>1</sup>尤其是經濟成長與所得不均間的關係一直都是最具爭議性的話題之一。

1950年代至1970年代初期，對於經濟成長以及所得不均的爭論主要著重兩者間此消彼長的情況。這時期關於兩者間關係最重要的論述是Kuznet著名的「倒U假設」(Inverted U-Hypothesis)。它假定所得不均的程度會在經濟發展的初期升高，然後在到達某個重要階段後開始下降，兩者間呈現倒U型關係，這個假設普遍受到當時研究者的接受。<sup>2</sup>

到了1970年代，眾人改變關注的焦點，試圖尋求既不妨礙經濟成長，又有助於減少貧窮現象的「重分配機制」(redistribution mechanisms)。然而這樣的轉變為時並不久，1980年代初期在美國政府和國際經濟組織(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的提倡下，強調自由市場和政府最小化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以及「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逐漸取代重分配機制觀點，主張所得分配應由市場自由決定，政府不應過度介入影響。<sup>3</sup>

但是到了1990年代，強調自由競爭的新自由主義學派受到了諸多挑戰<sup>4</sup>。這些挑戰新自由主義的觀點包括：Alesina與Rodrik透過跨國研究後得到財富(wealth)與所得不均度愈高經濟成長率越低，藉由降低政治上對資本稅的干預，所得重分配將有助於經濟成長的結論<sup>5</sup>。Torsten與Tabellini跨國分析後提出

---

<sup>1</sup> Anthony Shorrocks and Rolph Van Der Hoeven, *Growth, Inequality, and Poverty: Prospect for Pro-Poor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

<sup>2</sup> William Loehr and John P. Powelson 著，王慶輝 譯，前揭書，頁159-160。

<sup>3</sup> Anthony Shorrocks and Rolph Van Der Hoeven, op. cit., p.1.

<sup>4</sup> Ibid., pp.1-2.

<sup>5</sup> Alberto Alesina and Dani Rodrik, "Distributive Politic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Alberto Alesina ed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09(2), Cambridge: MIT Press,

所得不均會造成對經濟成長傷害的結論<sup>6</sup>，Perotti發現均等的所得分配將有助於經濟成長，並且透過跨國實證分析證實這個觀點<sup>7</sup>。Aghion認為不論是實際經驗或理論分析，所得不均對經濟成長有明顯的負面影響，高度不均現象，特別是當資產分配不均時，會對低度發展的經濟體造成負面影響<sup>8</sup>。這些認為經濟成長負向地與所得不均連結的觀點被稱為「習慣性一致觀點」(Conventional Consensus View, CCV)<sup>9</sup>。

到了1990年代末期，Forbes與Barro提出與習慣性一致觀點不同的看法。Forbes使用更完整的統計資料進行實證研究，透過跨國比較分析所得不均如何影響經濟成長後，他得到與習慣性一致觀點相反的實證結果：除了非常貧窮的國家外，其餘國家在中、短期(每五年為一研究期間)，一國所得不均度增加與經濟成長是有著正向關係，Forbes在以每十年為一研究期間的長期經濟成長與所得不均實證研究裡，也得到與中、短期相同的結果，但假設檢定模型的顯著性下降，兩者關係不若中、短期這般明顯。<sup>10</sup>Barro跨國研究後發現；在人均GDP低於2000美元的貧窮國家裡；高所得不均會阻礙經濟成長，但是在人均GDP高於2000美元的富裕國家裡，高所得不均將伴隨高經濟成長，因此富裕國家若進行所得重分配將傷害整體經濟成長<sup>11</sup>。Quah比較中國、印度和美國三國的吉尼係數後，提出經濟成長與所得不均兩者之間有正向發

---

1994, p.465.

<sup>6</sup> Persson Torsten and Guido Tabellini, "Is Inequality Harmful for Growth? Theory and Evidence", in Robert Moffitt ed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4(3), 1994, pp.600-621.

<sup>7</sup> Roberto Perotti, "Political Equilibrium,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Growth",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60(4),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1993, pp.755-776.

<sup>8</sup> Philippe Aghion and Simon Commander, *op. cit.*, p.276.

<sup>9</sup> Gunter Rehme, "Re-Distribution of Personal Incomes, Education,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across Countries", in Theo S. Eicher and Stephen J. Turnovsky ed., *op. cit.*, p.201.

<sup>10</sup> Kristin J. Forbes, "A Reassess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equality and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New York: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vol. 90(4), 2000, pp.871-885.

<sup>11</sup> Robert J Barro, "Inequality and Growth in a Panel of Countries",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00, vol. 5(1), p.32.

展關係<sup>12</sup>。這些認為所得不均度提高與經濟成長有正向變動關係的觀點被稱為「新挑戰觀點」(New Challenge View, NCV)<sup>13</sup>。

針對習慣性一致觀點與新挑戰觀點兩派間爭論，Atkinson及Brandolini從所得不均跨國分析的「量度」(measurement)進行解釋，他們認為文獻裡的量度存在者許多差異，不均度的衡量方式可以依據所得面<sup>14</sup>、消費面、健康、醫療或其他相關指標，測量單位有家計單位、個人、人均家計單位或不同群體，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適合不同量度的測量方法，例如在低開發國家較適合以消費作為衡量的依據。綜合而言，由於每個國家測量所得不均度時，量度都存在著部份程度上的差異，加上研究兩者間關係的學者選擇不同時期；以及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作為研究樣本，因此導致相異的研究結果<sup>15</sup>。

但是在俄羅斯的相關研究裡，經濟成長與所得不均兩者間的關係出現較一致的觀點。<sup>16</sup>Ivaschenko認為，在短期上經濟成長與所得不均呈現交替的現象，所得不均與人均GDP兩者間擁有正常的U型關係，代表一國位在經濟成長的發展門檻之下時高所得不均會對經濟成長造成負面的影響，而前蘇聯國家若非在轉型開始前就已經低於這個發展門檻，即是在轉型開始後經濟逐漸衰退到低於這個發展門檻，因此Ivaschenko預期在前蘇聯國家高所得不均將

---

<sup>12</sup> Danny Quah, “One Third of the World’s Growth and Inequality”, in Theo S. Eicher and Stephen J. Turnovsky ed., *op. cit.*, pp.10-12.

<sup>13</sup> Gunter Rehme, “Re-Distribution of Personal Incomes, Education,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across Countries”, in Theo S. Eicher and Stephen J. Turnovsky ed., *op. cit.*, p.201.

<sup>14</sup> 所得面依是否扣稅又可細分為可支配所得 (disposable income) 或毛所得 (gross income)。

<sup>15</sup> Atkinson Anthony B. and Brandolini Andrea, “Promise and Pitfalls in the Use of Secondary Data-Sets: Income Inequality in OECD Countries as a Case Stud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39(3), pp.771-800.

<sup>16</sup> See: Oleksiy Ivaschenko, in Theo S. Eicher and Stephen J. Turnovsky ed., *op. cit.*, pp.157-185; Philippe Aghion and Simon Commander, *op. cit.*, p.275; and Irina Dolinskaya, “Transition and Regional Inequality in Russia: Reorganization or Procrastination”, *IMF working paper*, wp/02/169,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02, p.16.

連結低經濟成長，他以轉型國家1989到1998年間所得不均和GDP成長為樣本作動態分析後證明這個假設，所得不均與經濟成長兩者間的關係在俄羅斯與前蘇聯加盟國是負相關。<sup>17</sup>Forbes與Barro的跨國研究雖然指出經濟成長與所得不均兩者之間有正向發展關係，但這種正向變動的關係僅出現在富裕國家裡，在貧窮國家裡正向變動關係不明顯，甚至成為反向變動的關係。俄羅斯在轉型期間的經濟表現並非富裕國家，因此所得分配維持在低度不均將有益於經濟成長。

## 第二節 最適所得分配

關於最適所得分配模型有著許多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應該將吉尼係數控制在接近瑞士的程度(吉尼係數為25%)，但也有人認為吉尼係數接近美國的程度(吉尼係數為40%)是較佳的。<sup>18</sup>雖然最適所得分配仍尚未形成共識，但是這些爭議大致可分為重視經濟效率或重視經濟公平這兩種觀點。

由經濟效率角度出發的觀點，主張所得分配應該維持在一定不均程度之上。這種觀點認為社會可以維持在較高所得不均，以刺激人民的生產動機、提升經濟效率使得總產出增加。例如Avtonomov和Soubbotina認為一個過度均等的所得分配制度將導致生產者缺乏生產動機，對經濟效率產生傷害，社會主義國家所得分配過度均等，造成員工缺乏積極性和訓練不足；商品品質低落；樣式貧乏以及技術進步遲緩等問題<sup>19</sup>。

此外，部分認為維持較高所得不均對經濟成長有助的論點，是建立在財富必須掌握在少數人的手裡，這樣他們才有能力去投資資金並建設工業的理論基礎之上。針對這個論點，Keane認為這類說法是起源於傳統概念；大規

---

<sup>17</sup> Oleksiy Ivaschenko, in Theo S. Eicher and Stephen J. Turnovsky ed., op. cit., pp.157-185.

<sup>18</sup> V. S. Avtonomov and T. P. Soubbotina, *The World and Russia, Material for Reflection and Discussion* Moscow: St. Petersburg University of Economic and Finance, 1999, p.26.

<sup>19</sup> Ibid..

模工業是帶動發展的火車頭，但是近代經濟理論有不同的看法，小規模企業以及對教育和醫療照顧的大量投資，才是扮演帶動經濟成長的主要角色。<sup>20</sup>

另一種觀點是由經濟公平的角度出發，認為所得不均造成人民中富有者與貧窮者之間的經濟差距擴大，隨著差距不斷擴大，富有者的優勢將延升到非經濟層面，如政治及教育上的優勢，所得不均成為社會其他不平等的根源。此外，所得分配過度不均等將影響人民的生活品質，變的更加容易產生貧窮問題，影響心理健康和教育進步並導致犯罪增加。<sup>21</sup>因此，由經濟公平的角度出發認為社會應該維持在較低的不均水準。

此外，Avtonomov認為高所得不均會對經濟成長產生以下負面影響：<sup>22</sup>

1. 高所得不均使人民對所處的經濟現況不滿，高收入族群與低收入族群意見更難取得共識，將導致國家政治不穩定。國家政治不穩定將使得投資風險提高，損害國家發展潛力。
2. 高所得不均使得一些重要市場機制的發揮受到限制，例如價格變動或罰款。以電費為例，其提高將使得能源配置更有效率，但是在所得不均很高的國家，政府不能提升電費，因為即使是微幅調升電費都將造成低所得階級的震盪。此外，例如提高暖氣費甚至會造成最低所得階層生命上的威脅。

暫且不論經濟效率和經濟公平兩派學者對最適所得分配之爭論，單就俄羅斯而言，由於在轉型期間屬於發展門檻之下的國家，所得不均程度偏高會對經濟產生負面影響，同時，由經濟公平的角度觀之，還會造成人民經濟狀況差異過大之不公平結果。

---

<sup>20</sup> Michael P. Keane and Eswar S. Prasad, "Poland: Inequality, Transfers, and Growth in Transition",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vol. 38(1),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01, p.52.

<sup>21</sup> V. S. Avtonomov and T. P. Soubbotina, op. cit., pp.26-27.

<sup>22</sup> Ibid..

### 第三節 轉型與所得不均

下表2-1為Vecernik整理出經濟體制由指令經濟(Command Economy)轉型為市場體制時所得分配方式的差異。在指令經濟時，分配方式是政府依照個人基本需求進行分配，因此所得不均的產生主要是因為國家政府的分配不均，而個人收益(earning)差異是由性別、年齡、重度體力勞動(hard manual labor)的能力及對政權忠誠度等因素決定。市場經濟分配是依照個人的技能及表現，因此所得不均主要是透過勞動市場產生，收入差異是由個人的人力資本、管理職位、風險承擔等因素決定。由此觀之，當經濟體系由指令經濟轉型為市場經濟，造成分配差異的因素也隨之多元化。Ivaschenko指出幾乎所有轉型經濟體在轉型過程中都發生所得不均實質增加的情形，造成轉型國家所得不均提升的因素是來自於結構性的改革，它是中央計畫經濟轉型成市場經濟時無可避免會伴隨發生的<sup>23</sup>。

但在Keane和Prasad的波蘭不均度研究中顯示出不同的結果，其根據波蘭家計單位預算調查(Household Budget Survey, HBS)研究發現，波蘭僅在1989年短暫出現過所得不均升高，隨後在1990到1992年間所得不均已下降到略低於轉型前的水準，但俄羅斯所得不均卻是大幅提升。<sup>24</sup>同為由指令經濟轉型為市場經濟的國家，但是基尼係數變動幅度卻有明顯差距，因此，吾人認為：若將俄羅斯轉型期間不均度升高，完全歸因於所得分配方式改變所導致的必然結果，是過於簡單的推論。吾人假設俄羅斯是在轉型政策的制定或執行上有所偏差，才導致所得不均度大幅提升。

---

<sup>23</sup> Oleksiy Ivaschenko, in Theo S. Eicher and Stephen J. Turnovsky ed., op. cit., p.186.

<sup>24</sup> Michael P. Keane and Eswar S. Prasad, op. cit., p.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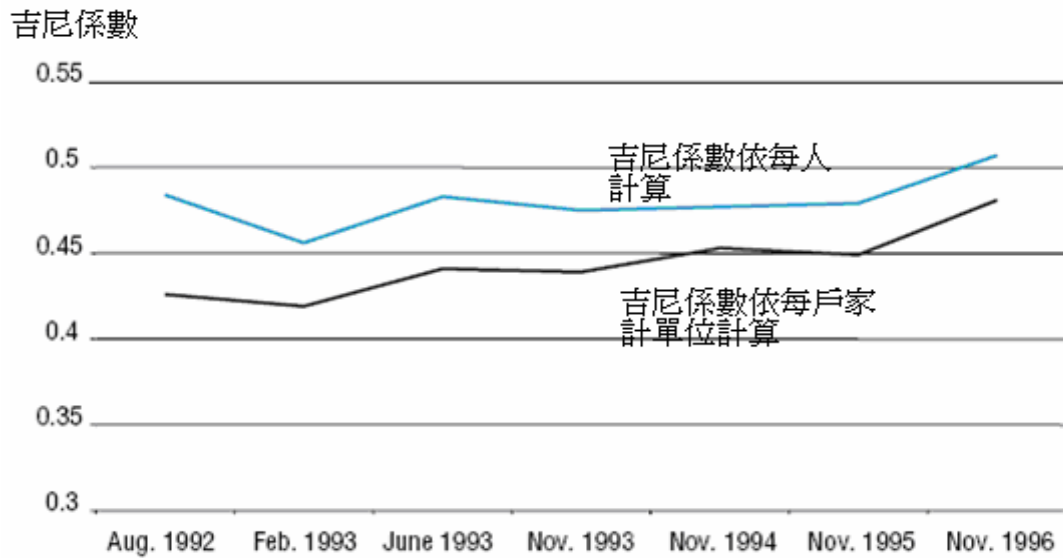
表 2-1：指令經濟及市場經濟所得分配的差異

特徵	指令經濟	市場經濟
不均的創造者	主要是國家	主要是勞動市場
分配的依據	基本需求	技能、表現
造成收入不均的主要因素	性別、年齡、重度體力勞動、對政權忠誠度	人力資本、管理職位、風險承擔
造成家計單位所得不均的主要原因	家庭從事工作的成員數，扶養的孩童數	家庭成年成員的收入不同
家庭主要支出	食物及其他低花費的個別項目	住宅、服務及少數高花費的個別項目
每戶家計單位所得與每人所得的相關性	低度相關	高度相關

資料來源：Jiri Vecernik, “From Needs to the Market: Changing Inequality of Household Income in the Czech Transition”, *William Davidson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No. 370*, Michigan: The William Davidson Institute, 2001, Schema 1, p.16.

此外，在不均度計算單位方面，根據表2-1最後一列指出，在轉型為市場經濟體制之後，每戶家計單位所得與每人所得的相關性將會由低度相關轉為高度相關，此點在世界銀行(The World Bank, WB)的調查報告 *Making Transition Work for Everyone* 中有相同看法，報告中指出在轉型期間俄羅斯雖然依個人計算的吉尼係數略高於依家計單位的數值，但是兩種算法間的差異屬於水平移動的平移差距，在變動趨勢上仍是幾乎完全相同(參見圖2-1)。

圖 2-1：1992～1996 年吉尼係數



說明：經 1992 年物價指數平減。

資料來源：Russian Longitudinal Monitoring Survey (RLMS).  
Cited from The World Bank, *Making Transition Work for Everyone: Poverty and Inequality in Europe and Central Asia*,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2000, Figure 4.2, p.143.

除了計算單位外，不均度指標計算方式主要分為依照所得面計算或消費面計算兩種，除了少部分獨立國協國家(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外，大部分的轉型國家此兩種計算方式的結果非常相近，<sup>25</sup>尤其在俄羅斯兩種計算方式的結果差異更是微小(參見表2-2)。

<sup>25</sup> The World Bank, *Making Transition Work for Everyone: Poverty and Inequality in Europe and Central Asia*,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2000, p.144.



表 2-2：轉型國家消費面與所得面計算不均度指標

計算方式	消費面計算不均度指標		所得面計算不均度指標	
	吉尼係數	最高最低所得級距倍數(十分位)	吉尼係數	最高最低所得級距倍數(十分位)
俄羅斯(1998)	0.47	8.06	0.47	8.78
匈牙利(1997)	0.28	3.49	0.25	3.07
拉脫維亞(1997/1998)	0.34	4.54	0.32	4.13
波蘭(1998)	0.34	4.29	0.32	4.25
斯洛維尼亞(1997/1998)	0.28	3.67	0.25	3.04
保加利亞(1995)	0.27	3.90	0.41	6.19
亞美尼亞(1998/1999)	0.32	4.08	0.59	19.29
喬治亞(1996/1997)	0.37	5.69	0.43	6.65
摩爾多瓦(1997)	0.41	6.14	0.42	7.43
吉爾吉斯共和國(1997)	0.42	6.35	0.47	10.40
塔吉克斯坦(1999)	0.32	4.04	0.47	10.60
馬其頓(1996)	0.34	3.83	0.37	5.77
克羅埃西亞共和國(1998)	0.32	4.29	0.35	3.76

說明：吉尼係數與所得倍數皆以平均個人所得或平均個人消費計算。

資料來源：The World Bank, *Making Transition Work for Everyone: Poverty and Inequality in Europe and Central Asia*,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2000, Appendix D, p.421 and Table 4.2, p.144.

亞美尼亞、喬治亞、塔吉克斯坦和保加利亞是依照所得面和消費面計算

吉尼係數差異較大的國家，這主要是因為這些國家在所得組成結構上，薪資收入和移轉性支付占所得來源比重較低，例如亞美尼亞和喬治亞薪資收入佔所得結構比重低於15%，喬治亞移轉性支付占所得比重不到3%，而自雇員工 (self-employment) 和非勞動收入 (nonlabor earning) 等其他所得占所得組成結構比重較高，由於這些其他所得相對於薪資和移轉性支付在所得面調查時難以計算在內，但這些所得的擁有者會將其用於消費之上，所以這些所得在消費面調查時會被計算在內，因此造成所得面和消費面計算吉尼係數的差異。<sup>26</sup>

相較而言，俄羅斯1992年薪資收入占家計單位所得結構比重49%，移轉性支付占31%，兩者合計占所得來源的80%，1996年薪資收入占家計單位所得結構比重39%，移轉性支付占27%，兩者合計占所得來源的66%，<sup>27</sup>比上述四國的薪資收入和移轉性支付比重高出許多，因此相對而言，俄羅斯依照所得面和消費面計算之吉尼係數差異十分微小。

故本文在探討吉尼係數變動趨勢時，依家計單位、個人、所得面和消費面計算之吉尼係數都將採用，並註明其計算單位及計算方式的差異。因此俄國的年度吉尼係數可能會因計算單位或計算方式之不同而出現數據差異，例如第6頁表1-2中俄羅斯1998年依家計單位貨幣所得計算之吉尼係數，低於第18頁表2-2依平均個人消費計算之吉尼係數，就是因為消費面計算之吉尼係數會高於所得面計算之吉尼係數，並且表1-2俄羅斯國家統計局僅計算所得當中的貨幣所得，會進一步低估吉尼係數，而造成兩個表格數據上的差異。但是在跨時區比較或跨國比較分析時，當然將採取相同的計算單位與計算方式，以使比較基礎一致化，如第6頁表1-2俄羅斯不同年度的跨時區比較，每個年度之吉尼係數皆以家計單位為計算單位，並以貨幣所得計算，以及第38頁表

---

<sup>26</sup> The World Bank, *Making Transition Work for Everyone: Poverty and Inequality in Europe and Central Asia*,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2000, pp.143-146.

<sup>27</sup> UNICEF, "A Decade of Transition", *Regional Monitoring Report No. 8*, Florence: UNICEF Innocent Research Centre, 2001, p.30.

3-5的跨國比較，每個國家之計算單位皆為家計單位，在計算方式上，除了菲律賓因為資料缺乏，必須採用消費計算之吉尼係數外，其餘各國皆為依照所得計算，如此在分析比較中所得國家的所得分配時，才能避免計算方式不同導致分析上的錯誤。

在影響所得分配的因素方面，Ivaschenko認為影響轉型國家不均度的主要因素包括：經濟發展程度、總體經濟情況(包括通貨膨脹和失業)、政府財政(政府支出、社會移轉性支付)、結構改變(自由化、私有化)以及外部因素(政治自由度、種族衝突)，<sup>28</sup>此外，穩定化對所得分配有正面影響，<sup>29</sup>課稅也會影響轉型國家的所得分配，但是由於轉型國家逃稅情況過於嚴重，因此累進稅率並未發揮降低所得不均的效用<sup>30</sup>。本論文將由這些因素中挑選與經濟轉型政策據有直間關聯的因素，包括總體面的通貨膨脹和失業、政府移轉性支付、自由化、私有化及穩定化等因素，來對俄羅斯轉型政策之所得不均影響進行分析。在本文是以研究經濟轉型對俄羅斯所得分配產生的影響為命題之情況下，對於經濟發展程度、政治自由度及種族衝突等因素，吾人認為僅政治衝突影響穩定化政策部份與經濟轉型政策具有直接關聯，其餘與經濟轉型政策無直接相關，故不在本論文中探討。

#### 第四節 所得重分配政策

有關政府所得重分配理論，可以分為效用主義學派(Utilitarianism)、自由主義 (Liberalism)學派和自由意志主義(Libertarianism )學派<sup>31</sup>。

庇古(A.C. Pigou)所創之福利經濟學就是屬於效用學派，主要是研究國民收入量和國民收入分配對社會福利的影響。庇古認為，由於同量收入或貨幣

---

<sup>28</sup> Oleksiy Ivaschenko, in Theo S. Eicher and Stephen J. Turnovsky ed., op. cit., p.159.

<sup>29</sup> Ibid., p.186.

<sup>30</sup> Ibid., p.162.

<sup>31</sup> 林建甫，「經濟公平與效率」，頁15，<http://linshi.twbbs.org/usr/n/ntussc/20041004.ppt>，2007年4月1號登入。

對窮人的邊際效用大於富人的邊際效用，因而在不影響國民收入總量的情況下，收入越平均，社會福利越大。其基本觀點是：一.在窮人的絕對份額<sup>32</sup>不減少的條件下；國民收入總量越大；社會福利越大。二.在不影響國民收入總量的條件下，窮人的絕對份額越大，社會福利越大。<sup>33</sup>所以，他主張實行收入均等化的政策，例如：徵收累進所得稅和遺產稅、擴大失業補助和社會救助等，這些都是可以在不增加國民收入總量的條件下，使社會福利得到增加。依據庇古福利經濟學的兩個基本理論觀點，北歐福利國家把充分就業和所得重分配作為政府的長期主要經濟政策，致力於提供更多的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

但基於邊際效用法則和效用極大化這兩種假設，效用主義學派推論政府不會使所得的分配完全平均。針對此點，自由主義學派根據「社會契約論」以及「公平推論」主張「最小值極大化準則」(the maximin criterion)，認為每個人剛出生時無法選擇自己的起跑條件，因此為避免悲慘發生，政府應該提高所得分配的最底層，使最少的效用(所得分配的最底層)極大以保證起跑點的公平，而不是如效用學派的要使全社會的總效用達到最大的主張。因此，自由主義學派比效用主義學派更要求所得分配趨於平均，並賦予所得均等化的公共政策正當性<sup>34</sup>。

自由意志主義學派強調所得分配過程的公平比所得分配結果的公平重要。由於社會本身並沒有產生所得，而是社會的成員產生所得，因此政府只要確定所得分配的方式是公正的，就不應該介入改變分配的結果，除非所得分配是透過不公平的方式，政府才有權利和義務進行介入。自由意志主義者的結論是，機會的平等比所得的平均還來得重要，政府應該強調個人的權利，

---

<sup>32</sup> 絕對份額指的是所得佔國民收入總量的比例。

<sup>33</sup> 林鐘雄，《西洋經濟思想史》，台北：三民書局，1990年，頁402至403。

<sup>34</sup> 林建甫，「經濟公平與效率」，頁20，<http://linshi.twbbs.org/usr/n/ntussc/20041004.ppt>，2007年4月1號登入。

確保每一個人都有相同的機會，利用他本身的才華來達到成功，這樣的機制一旦被建立，政府就沒有理由去改變透過這個機制所產生的所得分配的結果<sup>35</sup>，既使結果是非常的不平均，但這是社會成員經過自由意志選擇後的結果，因此仍是公平的。

三個學派分別以不同的角度為政府是否該介入調整所得的分配，以及該如何介入，提出理論上的依據。俄羅斯在展開經濟轉型以前，政府對所有產出之分配包括所得分配進行支配，追求絕對均等。然而，在1991年俄羅斯接受以新自由主義為基礎的「華盛頓共識」進行經濟上激進的轉型後，代表政府必須由產出的支配者轉變為所得分配的參與者，也就是透過所得重分配政策來降低經濟轉型後產生的所得不均。因為幾乎在所有經濟體在轉型過程中，都會造成所得不均實質上的增加，Commander和Lee指出政府成功的所得重分配政策能夠對轉型初期產生的所得不均發揮明顯的抑制效果。<sup>36</sup>這種說法可以從波蘭的例子得到最好的印證。

在波蘭的轉型過程中所得不均僅少量的增加，是轉型國家能夠避免所得不均增加的極少數例子。Gomulka指出這種成功轉型的「波蘭模式」，就是藉由大量的社會移轉性支付，尤其是退休金，來降低改革中所引發的社會成本<sup>37</sup>。Keane依據波蘭經驗指出，轉型過程中是否能避免所得不均大幅上升<sup>38</sup>，其中主要的關鍵是在政府的移轉性支付，政府的社會移轉性支付越高的國家，所得不均的增加越低<sup>39</sup>，例如在轉型期間社會移轉性支付最高的國家一波

---

<sup>35</sup> 陳慎慶，「從倫理學的進路討論經濟問題」，頁14，[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TC/Content\\_5642/be.ppt](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TC/Content_5642/be.ppt)，2007年4月1號登入。

<sup>36</sup> Simon Commander and Une Lee, *How Does Public Policy Affect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Evidence from Russia 1992–96*, London: EBRD, 1998, p.8.

<sup>37</sup> Michael P. Keane and Eswar S. Prasad, op. cit., p.140.

<sup>38</sup> Ibid., p.147.

<sup>39</sup> Ibid., p.142.

蘭、匈牙利和斯洛維尼亞共和國，也就是所得不均改變最少的國家。<sup>40</sup>但是他也認為，大量的社會移轉性支付將必須支付大量的成本，包括降低工作意願、財政稅率的扭曲、以及政府財政赤字等問題。並且，雖然大量的社會移轉性支付(尤其是退休金)，在轉型初期雖然可以有效的安置年老員工並幫助企業重整，但在長期卻會失去效用並且成為財政上長期的負擔。

由上述文獻可得知，俄羅斯政府若是在轉型初期就制定有效的所得重分配政策，藉由移轉性支付對低所得階層進行補貼與救助，將能使經濟轉型對所得分配產生的影響降至最低，故本文將對俄羅斯政府轉型期間的社會救助政策進行檢視，探討其是否有效改善所得分配。

## 第五節 黨國精英與所得不均

「黨國精英」(Nomenklatura)譯自俄文 *номенклатура*，原為俄文專有名詞，指蘇聯時代掌控政府部門與企業的共產黨政治精英階層。包括總書記、政治局、書記處、部長會議和中央委員等上層政治精英，以及共黨內的各部門領導、中央委員會的第一書記等重要職權等下層政治精英，在政府中包括聯邦各部門領導和各委員會的重要領導等政府官員，以及非黨派和政府成員的社會人士。黨國精英在二戰之後總計約達到10萬左右，占總人口千分之一。<sup>41</sup>

Nomenklatura國內有學者譯為「職官名錄」<sup>42</sup>，日本有學者譯為「紅色幹部」<sup>43</sup>。在西方的共產黨國家研究的文獻中，Nomenklatura被用來形容擁有特權、

---

<sup>40</sup> Ibid..

<sup>41</sup> David M. kotz、Fred Weir 著，曹榮湘、孟鳴歧 譯，《來自上層的革命—蘇聯體制的終結》，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35。

<sup>42</sup> 參閱：陳厚文，《蘇聯「職官名錄」制度之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碩士論文，1998年。

<sup>43</sup> 陳映芳，「前蘇聯階級結構的社會學分析」，[http://www.sociology.cass.cn/shxw/shfc/t20030826\\_0854.htm](http://www.sociology.cass.cn/shxw/shfc/t20030826_0854.htm)，2007年4月1日登入。

享有終身職務的黨籍官僚。<sup>44</sup>本文主要指轉型前在政治及經濟上擁有特權的階層，在轉型時期運用其特權以獲取經濟上的利益，因此選擇以黨國精英此一譯詞形容在轉型過程中將權力轉化為資本的階層。

俄羅斯展開經濟轉型後，最初的經濟精英就是由這些黨國精英轉化而成，在轉型過程中獲得大量財富的「新俄羅斯人」有61%是黨國精英出身，黨國精英保持轉型以前對俄羅斯社會的支配地位<sup>45</sup>。

陳映芳認為俄羅斯在轉型時期，黨國精英與社會最富有階層有明顯的關連。在布里茲涅夫時期壯大的黨國精英階層在社會轉型時期發揮了特別的功能，在沒有受到反彈的情況下便實現了將權力轉換為財富。1980年代後半葉開始，黨國精英從政治權力的特權轉向所有者的特權，政治精英轉化為經濟精英。黨國精英的特權包括：合資企業的設立、匯差的賺取、競租 (rent seeking) 行為、低利率貸款、所有權轉換時的優惠待遇、進出口活動的補貼、國有企業和銀行私有化等過程中對資產的詐取等。透過與中國的轉型比較後，陳映芳認為轉型期間俄羅斯的社會階層存在著明顯的延續性，俄羅斯在轉型過程中由原精英階層上升為企業經營階層(富裕階層)的比率明顯高於中國，代表俄羅斯在社會階層流動性上的屏障較高，俄羅斯社會分層呈現了相對的延續性與封閉性，因此俄國的黨國精英很高比例的在轉型過程中成為經濟新貴，而非特權階級則難以在轉型過程中獲取財富。<sup>46</sup>

Havrylyshyn與Odling-Smee認為在轉型過程中，經濟體制若是能快速的向市場經濟過度並且減少政府對經濟體制的控制，則黨國精英的影響力將大幅減少，若是緩慢的向市場體制過度，則會創造許多個人獲取超額利潤的機

---

<sup>44</sup> 韓麗，「中國立法的非正式性及其功能」，<http://www.xslx.com/htm/mzfz/fxtt/2002-10-16-10494.htm>，2007年4月1日登入。

<sup>45</sup> РойМедведев 著，徐元宮 譯，「俄羅斯社會階級分化新趨勢」，《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北京：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雜誌社，1998年第4期，頁113至116。

<sup>46</sup> 陳映芳，「轉型期社會開放度的中俄比較—比較歷史社會學的嘗試」，<http://www.frchina.net/data/personArticle.php?id=3693>，2007年4月1日登入。

會，並且這些機會通常是被黨國精英掌握。<sup>47</sup>最典型的例子是俄羅斯、摩爾多瓦、烏克蘭與亞塞拜然等國的政府能源與原料補貼政策，個人透過取得政府的貿易執照，將能低價購得這些貨品在以世界價格賣出，從中獲取大量的超額利潤。在轉型國家，競租行爲比生產活動更容易獲取利潤，黨國精英雖然不是競租行爲的必要條件，但是黨國精英的身分卻創造競租行爲的有利條件，因爲具有這種身分將能夠更早獲得內部消息與更容易接近政策決策者，在此競租體制下，行賄與利益共享(side-payment)是必然的產物。<sup>48</sup>到1990年代中期，原本的黨國精英持續透過市場改革獲取大量超額利潤，他們因而轉而成爲市場改革的主要支持者<sup>49</sup>。

由以上文獻得知，俄羅斯黨國精英運用本身有利條件，在轉型過程中透過合法與不合法的競租行爲大量累積財富，成爲所得分配中之富有階層，而其他非特權階級不但難以在轉型過程中獲取財富以增加所得，甚至因爲黨國精英競租行爲之剝削與詐騙造成所得減少，此消彼長的結果就是社會財富與所得向富有階層傾斜累積，所得不均惡化。而由歷史背景觀之，自1917年俄國革命以後，蘇聯政權的實際權力就一直完全掌控在共產黨領導階層手中，此一階層就是黨國菁英。雖然在1934至1938年間的史達林(Joseph Stalin)清黨運動中<sup>50</sup>，黨國精英曾受到衝擊，但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黨國精英始終處於權利支配的位置，這種精英統治的傳統一直延續至俄國開始進行轉型爲止都尚未消失。<sup>51</sup>除了歷史因素外，還可由地理因素觀之，由於俄羅斯地廣人稀，中央必須透過分層管理的方式才能有效管理地方，因而使得俄羅斯官僚文

---

<sup>47</sup> Oleh Havrylyshyn and John Odling-Smee, "Political Economy of Stalled Reforms",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vol. 37(3), September 2000,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p.7.

<sup>48</sup> Ibid., pp.7-8.

<sup>49</sup> Ibid., p.10.

<sup>50</sup> 李邁先，《俄國史(下卷)》，台北：國立編譯館，1969年，頁532。

<sup>51</sup> 張曉波，「蘇聯體制崩潰再思索：黨國精英的“革命”」，<http://www.whereshow.com/hotviews/russia/0560.htm>，2007年9月15日登入。



化比其他東歐國家嚴重，這皆使得雖然部份轉型國家私有化過程中也有官僚資本化(Nomenklatura Capitalism)問題，但俄國官僚資本化下黨國精英影響所得不均之情況相對重要。故本文將其列為觀察重點之一，欲探討擁有政治及經濟特權的階層，在私有化及自由化過程中之競租行為對其所得分配惡化之影響。

## 第六節 小結

經由前述文獻之回顧，進一步探討所得分配與經濟成長兩者間的關係，發現所得分配確實會對經濟成長造成影響，而決定正面或負面影響的因素主要視經濟發展程度而決定。在低度發展的國家，不均度提升會造成經濟成長負面影響，而俄羅斯在轉型期間的經濟發展程度，正是屬於低度發展國家，因此過高不均度將不利於經濟的發展。此外，由經濟公平的角度觀之，過高不均度還會使人民對經濟現況產生不滿，進而影響社會的安定並損害國家發展潛力。

雖然由指令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體制後會使得分配差異的因素增加，但由波蘭所得分配文獻中得知，所得分配惡化並不是經濟轉型下的必然結果，而是俄羅斯轉型政策上出現問題才導致所得不均度大幅提升。因此，俄羅斯轉型政策是如何影響其所得分配是值得關注的問題。

欲進一步探討這個問題，必須先瞭解所得分配主要衡量指標—吉尼係數。吉尼係數計算方式不像GDP已經有規定嚴謹的計算方式，不同研究組織通常會選擇不同單位和方式來計算吉尼係數，此外，吉尼係數不像GDP在每季或每年都會調查計算，而是跨年度或跨時區調查的經濟指標，這些都造成所得分配研究的困難。針對這個問題，本章回顧關於俄羅斯轉型期間吉尼係數的文獻，發現此時期俄國吉尼係數有兩個特性：首先，依個人計算吉尼係數數值略高於依家計單位計算的數值，但兩者間變動趨勢相符有很高相關性，其次，依支出面計算與依消費面計算之吉尼係數數值非常接近。因此，既使

不同研究組織選擇不同計算單位和計算方式所統計出的吉尼係數，都能表現出此時期所得分配變化的趨勢，故本論文在確定同一觀測點使用相同量度的前提下，將在不同觀測點使用不同方式所計算出的吉尼係數作比較分析。

在確定衡量方式後，必須決定研究影響所得分配的因素。經由上述文獻探討獲知本論文研究遵循Ivaschenko的觀點，由總體面的通貨膨脹和失業、政府移轉性支付、自由化、私有化及穩定化等因素，來對俄羅斯轉型政策之所得不均影響進行分析，並且將關注黨國精英在轉型過程中競租行為造成之所得分配變化。但由於經濟發展程度、政治自由度及種族衝突等因素並未與轉型政策有直接關聯，因此唯政治衝突影響穩定化政策部份將列入觀察外，其餘部分將不列入探討，儘管這三個因素也是影響所得分配的因素。